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学术专栏](#) >> [党的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宁波的实践(1)

发布日期: 2008/03/10 提供单位: 信息办

第一章 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与探索中加强

——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引领着宁波发展

王建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顺利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联系宁波实际,这些年来全市的发展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全市人民坚持“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精神,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使宁波的发展不断保持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进性,通过坚持不懈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增强素质、提高能力、优化作风,引领着宁波的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前,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和任务赋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实践探索,着力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一节 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思考

研究和探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廓清执政能力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历程和国家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画卷,拓展理论视野,明确战略要求,以正确指导对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探索。

一、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内涵

(一) 党的执政能力和能力建设的内涵。

所谓能力,是指人的各方面素质在实践中的综合体现。能力是针对人而言的,它的依据是人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中的作用。有了政党,特别是有了执政实践,就有了执政党的能力建设问题。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的整体素质在执政实践中的综合体现。总体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指的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 and 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本领。本质上就是要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能力。党的能力建设是一种综合要求。前者着眼于人员素质(因为能力本身是人所特有的),后者则突破了这一点,包含了更为丰实的内涵,如能力建设的对象,重点及基本要求等等。

(二) 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的几个要义。

1.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体和内容具有层次性。

其第一层次是作为执政党的整体层次。这个主体的执政能力建设重点应体现在民意汇集能力、政治录用能力、政治决策能力、维护稳定能力和政治教育能力上。第二层次体现在作为中观层面的各级党组织。这个主体执政能力重点体现在提升基层党组织成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上。重点体现在以协调党与政权，党与社会关系为核心内容上。第三层次体现在微观层次的党员个体和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总体上确定了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作了部署，而且也是对中高层领导干部能力方面的具体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准确地涉及了现代化事业进程中需要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可谓是从国际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文明建设到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全党中高层领导干部都能紧紧围绕以上五方面需要不断加强的能力建设内容，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无疑，会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一般干部而言，其执政能力的提高，笔者以为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履行职责的能力，二是依法办事的能力，三是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四是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能力，五是当参谋、能决策、用好人、高效落实各项任务的能力，六创新的能力。总之，要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增长实践才干，做好群众工作。

2.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这种制约具体体现在：执政理念是否端正，执政方向和目标是否明确，执政基础是否坚固，执政方略是否科学，执政体制是否先进，执政方式是否恰当，执政资源是否丰实并充分利用，执政的环境是否优化等等。当然执政能力的强弱对以上因素也起到促进和促退的作用。

3. 要明确评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标准。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大的方面需要有一个评价体系，有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才能检验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效。其评价的标准包括执政党所执掌的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它说明一个政权在群众中间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执政的法律、执政的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在一个执政党执政期间，如果其法律和制度能够得到持续有效地遵守，那就说明其具有了足够的执政能力；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在治理社会中所体现出来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就直接体现出执掌政权的能力，效率高，成本低则无疑执政能力强，反之则低；社会秩序与风尚的维系程度，它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执政理论建设的与时俱进和先进性，它是体现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坚持的原则。

这些原则应包括：

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指导。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反映了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内涵、执政责任、执政要领、执政本质。

2、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

“三基本”从根本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三基本”的能力越强，越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有效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3、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

我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承担着执政的主要职责，他们的素质高低，一个地方和部门经济社会发展得快慢，人民群众对我党满意度的高低，同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联。从某种角度讲，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4、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

大量事实证明，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出现的诸如把经济工作政治化，搞“经营城市”、“泡沫经济”、“形象工程”，家长制、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一些党员干部受贿、贪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等现象同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上的缺损不是没有关系。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5、发展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强弱的实践标准。

当然，这种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6、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

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量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政之道就在于爱民，爱民之道就在于体察老百姓的疾苦。这可称是一条铁律！

二、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历程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经有过局部执政的尝试和经验。我们党局部执政的历史，大体可分为根据地时期（1927年—1934年）、延安时期（1934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9年全国解放）三个阶段。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我党的局部执政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政权，其主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因此，在局部执政时期的我党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革命党”而非建设的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执政从局部执政转向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执政。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开始萌芽。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的新形势，毛泽东同志把执掌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学会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会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本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雏形。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勾画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雏形。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基础奠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要重视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2]。同时，他对如何加快发展、推进制度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3]；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要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与当代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联系起来，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早在1989年12月，江泽民同志就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4]1996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的讲话中，把提高执政能力问题作为讲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只有讲政治，才能使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5]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讲话指出：“认真、刻苦、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对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极为重要的”[6]，这在党的文献中首次使用“执政能力”的概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并明确提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体系丰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加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专门进行集中学习，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同年，8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各项部署，正式提出了“五个方面能力”要求，即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2006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和

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和丰富发展。这“三个执政”重要思想和“五个方面能力”要求是我们党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关于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我们党几代领导人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上的重要探索，是一脉相承的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深谋远虑，把党的建设放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赋予了党的执政理论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三、国外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当今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据统计，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较有影响的各类政党有5000多个，只有20多个国家不允许政党存在，其余国家的政治运作都是通过政党来实施的。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都要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尽管不同的政党，在不同的形势下，获取政权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但是治国安邦、巩固执政地位，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就很难巩固执政地位，更谈不上长治久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力量组合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和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和考验。为此，各国执政党在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以便在未来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各国执政党之间政治主张和执政方式有所区别，执政的绩效和后果有所不同，但都有自身的执政规律，其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有的甚至完全瓦解。尽管原因十分复杂，各个党的情况也很不相同，但究其根源，无一不是没有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和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脱离群众，失去民心，违反执政规律，失去执政能力所致，其经验教训尤为深刻。这里，我们重点就这些经验教训引发的思考作一简要阐述。

1、坚持理论创新是党执政的生命之源。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这已为世界上许多执政党的执政实践所证明。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最初都很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共在列宁领导下，开拓进取，大胆实践，短短几年便在创立政治体制、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后来，尤其是个人崇拜形成之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繁琐哲学盛行，苏共逐渐丧失了理论创新能力。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之后，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宣传活动中，求稳怕乱，说套话、说空话、说假话成风。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判断，一用就是好几十年。再后来，苏共又从思想理论僵化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搞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造成思想理论的极大混乱和整个社会的全面失控。东欧国家的执政党受此影响，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结果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丧权亡党。在非洲和拉美，不少国家的执政党机械地照搬西方执政理念，盲目推行“多党制”，结果使党逐渐脱离本国实际，丧失了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纵观以“思考的党”自称的西欧社会党。它们重视思想多元、纲领变革、观念开放和政策创新，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欧一些社会党为应对全球化发展要求，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思想，指导本国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从而增强了对形势的适应力，一度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执政参政。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的新纲领大讨论已持续数年之久，有时还邀请党外人士和国外政要参加，使得纲领革新成为全党思想观念更新的自然进程。历史充分表明，党的理论、纲领僵化，党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执政党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促进国强民富是党执政的首要任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是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得靠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否则，党执政就没有了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执好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最初实行这种体制，有利于统筹各方利益，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在二战前后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东欧各国也曾取得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但是后来，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忽视时代发展变化，固守传统的经济关系和管理体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抑制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在国际竞争中明显落后于西方，由此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渐产生疑问。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弊病充分显露，改革的失误又使其雪上加霜。1990年时，苏联每卢布只有12戈比的商品保证，1200种主要消费品有1150种短缺，人民群众进一步丧失了对执政党的信心。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曾经深得印度人民的依赖和拥护。但在执政45年后，这个百年老党丧失了印度的霸主地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激化，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失望。印度独

立后前30年GDP增长率仅为3.5%，远远落后于同期亚洲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一个执政党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丧权亡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则根据国情变化，提出“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从20世纪60年代制订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开始，到90年代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促使经济不断跨上新的台阶，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不断巩固。

3、提高干部素质是党执政的决定因素。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党的执政能力。党能不能执好政、掌好权，关键在于能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造就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执政骨干。苏联和东欧的执政党都比较重视党的干部的选拔、教育和培养，都设立了庞大的党政干部教育、培训系统，但这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基本上都是以“人治”为基础的，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滥用权力的问题比较突出。党的领导干部成了特权阶层，有特供的商店、餐厅、医院、别墅等。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同人民群众拉开距离，这是造成人民群众对苏共、对社会主义产生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长期实行单一的干部任用制和变相任命制，造成了干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任人唯亲、裙带风，致使许多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不称职的人混入各级干部队伍。这不仅削弱了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同时也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对党离心离德。目前，越南党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在遴选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党员可以自荐；对中央委员进行差额选举时，要公布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基本情况等，普通党员和群众可以直接提出意见；探索从制度上解决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问题，对中央委员候选人实行年龄限制，同时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任职不能超过两届，保证党和国家后继有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有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每次大选后，该党从全国各行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干部候选人，再进行有计划培养，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4、优化领导体制是党执政的制度保障。一个执政党，只有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才能更好地履行执政使命。苏联和东欧的执政党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行政命令式的执政方式，党政合一，过度集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领导体制，妨碍了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造成党政机关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权责不清，效率低下。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的个人迷信、惟意志论之所以一再发生，都源于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同时，苏联和东欧等一些国家的党都没有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党内民主制度，在权力运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长官意志高于一切，党内官僚主义泛滥，这样就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党的高级机关和领导人手中，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发挥作用。戈尔巴乔夫个人独断专行发展到极端，架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断一切而不受约束和监督，甚至发展到最后出现由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名义建议解散党，而全党又无能为力的现象。此外，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党内搞个人独裁，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实行家族式统治，都大大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实践表明，领导体制有问题，是党执政的大问题；工作机制有隐患，是党执政的大隐患。要使执政党实现自己的执政使命，必须从制度入手，积极构建适应时势要求、善于发挥集体作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增强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

5、加强反腐倡廉是党执政的兴衰之本。历史实践表明，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有很多制约因素，而自身的腐败则是一个致命伤。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何防范和治理腐败，日益成为各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为此，许多政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举措。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北欧国家一些政党通过制定政党资助法、党的收支账目公开制度以及财产申报与定期清查制度，实行高薪养廉、厚禄养贤，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不少执政党，反腐乏力，腐败盛行，导致党执政的衰落乃至败亡。意大利天民党、社会党执政时大搞权钱交易，并按它们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多少，在政府的招标回扣中进行利益分赃，逐渐导致党的肌体溃烂，党的形象败坏，最终在90年代初的“廉政风暴”冲击下衰亡。日本自民党也是因腐败等问题不断导致党内接连分裂，1993年8月被迫成立多党联合政府，从而结束了执政38年的历史。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权力缺乏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印尼专业集团执政几十年，苏哈托及其子女巧取豪夺，聚敛钱财达200亿美元，引起极大民愤，甚至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引发全国动乱。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的原因，不是没搞好经济，而主要是腐败蔓延。在墨西哥，“制度党是腐败的同义词”，包括总统萨利纳斯在内的自上而下的腐败已经制度化，最终被选民抛弃。

国外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着力于准确地把握执政环境的新变化，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具体任务，不断增强长期执政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从应对复杂局面、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干部素质、优化体制机制和加强拒腐防变等多个方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待续)

本信息共浏览：**587**次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打印文本 \]](#)

[关闭窗口](#)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网管信箱](#) | [网站导航](#)

版权所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系统建设：宁波市委党校信息化办公室

联系电话：87082028 Email：admin@nbdx.cn